

老问题与新视角：环境史视野下的赣南社会研究¹

李晓方

赣南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历史上就是一个动荡之地，盗匪横行，土客冲突严重，社会秩序混乱。虽经明代王阳明治理南赣，施行教化，却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动荡局面长期延续。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赣南建立苏维埃政权，深刻影响和改造了赣南社会。历史表明，人口流动、土客矛盾、治乱交替，是赣南社会变迁的主要特征。明代中期虽经王阳明治理，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动荡局面。然而，正是在此环境条件下，孕育出了革命摇篮。从环境史的视野出发审视赣南社会，有望在人口资源环境史、客家文化和赣南宗族史、苏区社会史、阳明文化与地域社会研究方面实现视角转换和新突破。

【关键词】：环境史；赣南；客家；王阳明；中央苏区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2)12-0121-09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迄今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程。根据研究特点和学术取向，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属于社会史研究复兴和整体性研究的阶段；后20年属于社会史研究深化和区域性研究盛行的阶段。时至今日，无论是华南历史人类学者所倡导的“走进历史现场”，还是华北区域社会史学者所践行的“走向田野与社会”，都共同强调自下而上、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结合，以特定区域为中心开展整体性、长时段的研究路径，这已然成为学界共识，对开展不同区域的社会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引领和示范效应。尽管继社会史研究之后，在当前中国史学领域先后涌现出诸如新文化史、医疗疾病史、微观史、环境史等新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却难以动摇和轻易替代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主导地位。

一、动荡之地：赣南的历史与环境

赣南，明清时期江西南安、赣州二府，也是当年的“南赣地方”，今日的“赣南地区”。作为一个有其历史和现实独特性的区域，这里山林密布，河流纵横，多山多洞，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远离区域政治中心，族群复杂，历来是政府管辖的薄弱区域。自西晋“五胡乱华”，中原大批士民为避战乱举族南迁，在该区域与畬、瑶等本地居民交互融合，孕育出新的客家民系。明代嘉靖以后至清前期，赣南各地不断有闽粤无业流民迁入，加剧了赣南原本复杂的族群矛盾。据黄志繁研究，自12世纪以来，这里已是盗匪纵横，贼民难辨，堪称盗匪乐园。有学者将明代赣闽粤湘交界区域直接称为“盗区”。^①转折性事件发生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平定赣闽粤湘交界区域的严重匪患，还地方以安宁，王阳明的事功正是成就于此，所谓：“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1]（卷一九五《王守仁传》，P5162）为了南赣区域的长治久安，王阳明感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2]（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P168），决计从根本上净化山贼滋生的土壤。于是，在南赣兴办学校，颁布《南赣乡约》，实施教化，移风易俗，推进宗族乡绅自治，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赣南民众感念王阳明的恩德，阳明文化在赣南大地处处可见，俨然成为一种文化基因。

然而，阳明之后的明清时期，赣南匪患问题依旧存在。据唐立宗研究，明代中期以降，南赣地方的盗贼活动更加活跃，从

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南赣地方文献中王阳明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2XZS005）、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中心）项目“明清时期赣闽粤客家地区的自然灾害防控研究”（JD20008）

李晓方，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王阳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流贼、流寇的打家劫舍，迈向组织化的集体形式与家族化经营方式。^{[3] (P247)}迨至清代中叶，赣南“会匪”名目繁多，活动猖獗。^{[4] (P93)}道光六年（1826），御史熊遇泰上奏道光帝：“江西赣南一带，近有匪徒烧香结盟，每人带刀一柄，名为添刀会，聚党至数百人，出没无常，沿途抢劫。”^{[5] (卷一〇一，道光六年七月丙午，P663)}据《清实录》统计，单是道光朝的25年里，由总督、巡抚、御史等官员向朝廷报告赣南“会匪”活动的折子就达17次之多。^{[4] (P94)}“会匪”与盐枭、盗匪、烟贩、兵丁相互勾结，逐步发展成为势力强大的武装集团，对抗官府，为患地方。

延至民国时期，赣南匪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1939年，蒋经国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兼赣县县长。到达赣州后，他发现当地烟、赌、娼盛行，土匪恶霸作乱，宗族间的械斗经年不息。有研究者指出：“蒋经国上任前，这里是江西的化外，各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天大，地大，除了总裁就是他。’买卖兵役，乱增捐税，成为常事。烟民的数量超过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圩子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许多地方民匪难分……商贾大号掌有乡村大量的良田。民众的绝大多数斗大的字难识一担。难童、游民无处安身。”^[6]目睹此情此景，蒋经国厉行“三禁一清”政策，即禁烟、禁赌、禁娼，肃清土匪，以期“除暴安良”，恢复社会秩序。然而从最终效果来看，仍难说完全根治。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赣南，也构成了赣南的特性。赣南区域社会的研究，就是要从这一区域特性出发。

结合赣南区域长期动荡的历史，应当首先从生态资源、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审视，进而在长时段视野下开展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从生态资源来看，赣南是一个山林覆盖率极高的区域。单就当下赣南林地和森林覆盖率来看，赣州市林业用地面积4552.4万亩，占全市国土面积的77.1%。全市森林覆盖率74.2%，位居全国前列。如今的赣州已是一个人口近千万、占江西全省人口1/5的人口大市。较之五代、唐宋、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翻了数番。当地森林资源历经近千年开发仍保持如此规模，可以想见，历史时期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当不会低于今日，其地人口规模和开发程度则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

就生存环境而言，这里是一个“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丘陵山区。赣南的这一环境特点，使得传统小农经济很难得到充分发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靠农业种植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更何况唐宋以来还要面对不断迁入的中原士民和家族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资源争夺和生存竞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业不能为地方社会的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人们只有选择其他替代产业。从赣南民众的长期生存实践历史来看，木材交易、私盐贩卖、蓝靛染料和烟草乃至鸦片种植等成为当地人的首选，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山区商品经济在明清以来得到蓬勃发展，势不可挡。在巨大利益驱动下，人们铤而走险，非法交易、武装走私贩卖，即使是地方官府也很难弹压。王阳明虽能平定南赣动乱于一时，却无法保南赣太平于永久。特殊的地理区位、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使得社会秩序混乱成为这里的常态，赣南的历史由此变得与众不同。

就生产方式来看，流动性和开放性成为当地人谋生的一个重要特点。以木材交易为例，由于山林覆盖率高，木材自然成为当地最易取得的生存资源，而章江、贡江以及章贡合流后的赣江，遂成为木材运输的黄金水道。人们将大批的木材做成木排，自上而下，一路漂流，直至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的南京、无锡等江南繁庶之地。在此过程中，依靠木材运输为生的赣江上游“水上人”群体也随之产生，在赣南客家围屋中生活并居住着大量依靠木材生意发家的商人家族，清代龙南县关西围的徐老四即是典型代表。

再如明末清初尤其是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兴起的烟草种植，在赣南区域经济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无县不种烟草。雍正《江西通志》载，赣州府“各县皆种，而瑞金尤甚”^{[7] (卷二七《土产》)}。在此过程中，闽粤移民不仅是赣南烟草生产的主体，来自闽粤的外籍商人更掌控了烟草的加工与贸易。通过大庾岭和龙岩—宁化通道将赣南烟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闽粤大地，使得赣南成为烟草生产、加工和贸易的重要基地。由于烟草利润远高于种粮，遂大量挤占粮田，这使得当地经济更加具有外向依赖的特点。据研究，清代烟草种植和贸易已是当地一项支柱性产业。^[8]一旦烟草歉收或市场波动，当地的粮食供应问题便会显现，难以自给自足。这样就使当地社会经济有了潜在风险。山区商品经济带给人们收益的同时，又似一把双刃剑，使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活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如何构建一个合理和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利于地方长治久安，便成为一道难题。

因此，从人口资源环境史的角度开展赣南区域社会研究，系统展示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山地与平川、内部与外部、本

地居民与客民的复杂互动关系，是符合赣南区域社会特点的一条学术门径，值得花大力气深入探究。正是由于赣南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特点，为走私贸易、烟草种植、非法经营、偷税漏税、匪盗武装提供了温床。环境与生存选择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是赣南区域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

二、客家与赣南宗族社会

人口的流动性构成赣南区域的一个突出特征。赣南人口流动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这里的客家人群体正是历史上北人南迁的一个结果。赣南客家人既有自北而来永久定居者，也有途经赣南继续南下闽粤之后的回流者，即所谓“老客”与“新客”，经历了长期复杂的人口迁移过程。

赣南在地理位置上“南控百越，北达三江”，加之赣江作为连接内外、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水上交通发达，自古便是中原汉人南下闽粤的必经之地和人口迁移的中转站。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开凿梅关成功，大庾岭驿路建成，昔日偏僻的赣州、大庾古城成为“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江南名州，近4万平方公里的赣南大地吸引了大批拓展八荒的“北客”。区域人口急剧增长，史载西晋南康郡所辖五县人口只有1400户，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已增至46116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因黄巢之乱，当地客家人为避战乱，溯章、贡二江而上，跨南岭，过武夷，入闽粤。罗香林研究指出：“客家先民，大抵先自中原南下徙赣，再由赣徙闽，复由闽徙粤。”^[9]正是对这一人口迁移过程的精辟概括。明清时期赣南地区出现闽粤客民“倒迁入赣”的回流现象。罗勇指出：“寻邬、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约占70%-90%；赣县、兴国、于都、会昌、瑞金等县约占50%-70%。”^{[10] (P66)} 闽粤客家人回流赣南的根本原因是生活所迫，为解决生计问题，主动应政府招募入赣垦荒。除此之外，进入赣南的还有“闽粤流民作乱犯境”，被官兵讨平后就地安置垦荒，也有清政府为解决华南土客械斗问题，将珠江三角洲部分客家人遣散回客家原乡或安插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如今赣南客家人中，不少就是土客械斗以后从广东迁入江西的。

赣南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其中，客家围屋和围寨是最典型的代表。据饶伟新研究，自明中叶至清代，由于险恶的地理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动荡，赣南乡村居民自发地构筑大量用于军事防卫的乡村围寨，于是形成广泛而持续的筑寨建围运动。伴随着乡村围寨的构筑和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乡族势力尤其是宗族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并日益军事化和割据化，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非常成熟的支配力量。乡村宗族构筑围寨，“聚族自保”，直接导致“聚族而居”聚落的形成，聚居宗族也得以强化，这展示了赣南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宗族发达并与村落重叠，这一普遍而显著的社会人文现象的历史形成过程。^[11]在这里，“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乡村自保—构筑围寨—聚族而居—村落宗族”，构成了赣南客家宗族的显著特点。

那么，从客家人的主体性来看，这些有着不同身份和人生经历的客家人，又是如何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如何定位他们自身，如何构建自己的文化呢？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得到清晰的阐述。结合笔者在赣南乡村的田野考察和地方文献记载，可举两例来说明这一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龙南西昌围和关西新围是当地经营木材生意发家的徐氏家族宅院。其中，西昌围是徐家老一辈祖业，东海堂是徐氏堂号。在徐氏老围祠堂内有一祖宗牌位，上书“杨公福主徐公讳有翁暨历代先祖考妣宗亲神位”。旁立一方题名为“志杨公”的小碑，碑文载：“南宋末，世道乱，生灵涂炭。吾关西徐氏始祖有翁公，于理宗嘉熙丁酉自泰和水南徙居南下，途中遇险境，承蒙杨公救之。定居关西后，为感恩杨公，嘱子孙将其列于祖牌之上，以永志杨公福主。”^②此碑颇具深意，其中所述徐氏始迁祖徐有翁在南迁过程中遇险被杨筠松搭救这一情节颇为离奇，至为关键。在赣南很多宗族的历史叙事中，多有类似表达，如三僚曾、廖二氏，声称二世祖先为杨筠松之亲传弟子，也是两个世代专门从事风水术的家族。杨筠松系唐僖宗朝国师，是著名的地理风水师，于黄巢之乱后避居赣南，其地理风水术流行于世。这些声称与杨筠松有交集的客家宗族，或许有真有假，但借助极有影响的历史名人去建构自身历史和身份的行为，在宗族研究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关西徐氏南迁过程中得杨筠松这一大人物救助，无疑有助于证实并提升徐氏家族的声望，徐氏历代奉杨公为福主，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报恩。这与刘志伟在研究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史时揭示出的水上疍民上岸、山上畚民下山时，通过援引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来构建自身来源之合法性、正统性，以进入王朝编户齐民体制的手法具有相似性，且各具区域特色。

无独有偶，杨筠松之外，赣南客家人在宗族建构中，也有意识地与王阳明平定南赣动乱事件建立联系，借以证明或宣扬宗

族历史和祖先荣耀。如赣州龙南县的一些宗族谱中，多载有与王阳明在赣南相关的内容。1936年龙南月氏六修族谱中记载，月氏三世祖月秉武的三子月华，“补郡弟子员，以岁额当荐入公车。会岑冈三峒之役，起幕府，以华知兵，辟为军谘祭酒，指授方略，贼赖以平，功当授武秩，辞不就，请以校官致仕，幕府高之”^{[12] (P281)}。表明月氏祖先曾随王阳明平定匪患建功。同样，龙南桃川赖氏六修族谱（乾隆四十四年修）记载赖氏先人赖时雍，“明正德间，寇起粤东，王阳明亲提大军，用公为平浏参谋，屡出奇计，捣其巢穴，捐躯以报国，誓死以歼贼。朝廷嘉乃精忠，祀之乡贤”^{[12] (P289)}。类似内容在黄氏龙南宗谱中也有记述：“第五世金馗，字前江，明王守仁督军于赣，公为乡总。后征三泐，征三巢，官至游击，享年九十有六岁。”^{[12] (P293)} 此类记载一方面表明王阳明平定三泐之乱在赣南民间确有影响，不少当地人都参与了平定动乱的行动；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杨筠松一样，王阳明也成为当地宗族建构自身历史时惯用的一个身份符号。只有借助这样的叙事，才能为宗族自身的发展和参与地方竞争、获取合法性和话语权提供依据。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崇义《思顺何氏族谱》记载，一个名为桶冈洞的地方，为匪之巢穴。何氏父子三人，“与匪居相近，常有志剪除而力不及逮”^{[13] (P18-19)}。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南赣剿匪之时，何氏父子军中献计，亲做向导督兵前往，不幸丧生。父子三人义行受到王阳明的抚恤和嘉奖，不仅为他们修庙祭典，还奏请朝廷赐“桶冈洞四履山场为祭资”^{[13] (P18-19)}。然此事仅民间族谱记载，并不像龙南月氏、赖氏、黄氏那样在方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可相互印证。这就表明赣南民间确有不少宗族借王阳明之名为他们谋取现实利益背书。事实究竟如何，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史料详加考证。

三、王阳明与赣南阳明文化

明朝中后期，南赣盗匪流民流窜汇聚，各种矛盾交织激发，加上官府治理无方，终致动乱不断，成为朝廷心腹之患。正德十一年九月，王阳明临危受命，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出任南赣巡抚。第二年正月十五日王阳明到任后，凭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举平定了福建漳南的詹师富之乱。接着，他通过推行“十家牌法”，切断“山贼”的情报联络；通过疏通盐法，解决兵马钱粮之需；通过组建民兵和提督军务，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王阳明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又平定了以蓝天凤、谢志珊为首的横水、桶冈之乱，以池仲容为首的三泐之乱。一年内成功平息数十年的南赣“积寇”。在担任南赣巡抚任上，王阳明又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的事功达到鼎盛，也因此封伯赐侯。历经百死千难的王阳明，在南赣巡抚任上，提出了用以概括其一生学术精髓的“致良知”。

毫无疑问，赣南是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王阳明或阳明文化已经成为赣南的一个重要象征和身份标志，“阳明过化之地”是赣南区域社会的重要文化符号和精神资源，值得深入挖掘、不断丰富与提升其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阳明心学和阳明文化是目前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是成就最为显著的领域。然而从区域社会史角度而言，深入研究、解读阳明文化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应是赣南区域研究中需要花大力气研究的问题。这是在赣南研究阳明文化时最具区域特性和创新性的地方。不难发现，阳明文化在地域社会发展中，其实存在两种截然相悖的现象。

一方面，阳明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主要推动力量是主政一方的各级官员和地方知识精英群体。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动乱和宁王叛乱中的突出事功，为后世所景仰，尤其是主政赣南的各级官员。在王阳明之后，赣南各县动乱再起，动荡不定的局面依然存在，如何效仿王阳明，有效平定地方动乱，恢复社会稳定秩序，是悬于府县官员心头脑际的一把利剑。效仿阳明，保一方太平，用阳明心学和文化教化民众，做到知行合一，是各级官员的行动自觉，更是衡量官员称职与否的标尺。于是我们看到，呈现阳明足迹，展示阳明思想，弘扬阳明功绩的各种祠堂、岩洞、碑刻题记和历史遗存遍布赣南大地。南安府、赣州府属各县，几乎每县建有阳明祠庙。推动这类建筑兴建和遗存保护的主体，就是赣南各级官员和尊阳明为师的王门亲传、再传弟子。官员们积极效仿阳明治理赣南，将其打造成为主政一方官员的榜样和行为表率，言必称阳明。直至抗战时期，主政赣南颇有成绩的蒋经国，也是以实际行动致敬王阳明，使他在赣南的新政颇具影响。

掌握文字工具的王门弟子，在赣南各县方志书写中，也极力宣扬王阳明的功绩和影响。据统计，明代赣州府有名可查的阳明弟子有25人，其中亲传弟子11人，再传弟子14人。^{[4] (P191)}作为王门弟子，他们积极参与了移风易俗、地方防务、阳明祠庙的修建等公共事务。在阳明弟子编纂的年谱和地方士绅编纂的方志中，都对阳明文化进行了宣传甚至夸大。如《年谱》中载阳明剿匪班师返回时，“师至南康，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2] (P1247)}。这种万民膜拜的盛况，是否如实反映了客观事实，是令人怀疑的。再如万历《瑞金县志》中，载有王阳明在当地“驻司一月”

的说法。据考证，无论是王阳明提师征讨漳南还是班师回赣途经瑞金，在瑞金停留不足7日^{[14] (P203)}。对于这一严重失实的记载，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做了删除，但县志编纂者仍努力挖掘王阳明途经瑞金的史实，将瑞金塑造为“阳明过化之地”的文化形象。

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地家谱和民众记忆中的阳明历史和文化。在赣南各县姓氏族谱中，除讲述他们祖上为王阳明建言献策、跟随大军建功和被表彰的事迹外，也有其他反面的记录。家谱和民众记忆与官方记载的历史之间的偏差，需要多角度发掘以还原历史真实。如《黄氏龙南宗族》中有黄氏仁字辈8名男丁“生失考，往外”或“夫妇二生未详，往外”的记载^{[12] (P292)}。这些黄氏族人何以“往外”，是外迁还是外逃，值得细究。因为他们“往外”的时间恰恰与王阳明赣南平乱的时间一致。有理由怀疑黄氏族人中有人因“作贼”身份败露而被迫外逃，此事不能公然宣传，只得隐晦地表述为“往外”。黄氏龙南宗族中的一条记录或能为此提供依据：“第四世孔智，因先年叛乱外出未回，生歿葬妣俱未详。”^{[12] (P294)}这里的“叛乱外出未回”与“往外”两者之间，或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内容。如前所言，赣南民众“贼民之间”的身份其实是他们对生存环境的选择和适应，多数或是无奈之举。因此王阳明平动乱，对于官员和地方士绅大族来说，无疑是久旱甘霖。对于那些发动或参与动乱的民众而言，则是没顶之灾，因而不得不外出逃生。

正因为如此，在民众记忆中，便出现了为王阳明负面的评价和认知。笔者在大庾县、崇义县调查时，曾采集到两则当地群众讲述的王阳明故事。一则是说王阳明其实没多大本事，初到赣南时常打败仗，后来是靠着当地人给他出谋划策才转败为胜。一则是说王阳明用兵残忍，杀人如麻。崇义县一个名曰“思顺”的地方，有一条山溪河流，因为王阳明在这里杀了很多人，血流成河，怨气煞气重，老百姓经过这里时要么绕道，要么快速通过不敢稍作停留。如果将这两则记忆与历史时期当地人或为贼或为民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就变成了当地人一种被伤害和创伤的心灵记忆。

可见，研究阳明文化与赣南地域社会的历史，需要我们从正反两面，甚至多个角度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联，为阳明文化研究注入新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四、中央苏区与赣南红色革命精神

20世纪30年代，赣南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中央苏区的历史就是以赣南为中心的历史，也是赣南有史以来最为闪耀的高光时刻。深入开展中央苏区史尤其是苏区社会史研究，提炼和弘扬赣南红色革命精神意义重大。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先后在赣南于都、兴国、宁都和闽西永定、龙岩、上杭等县建立红色政权。1930年3月，赣闽粤三省边境红色区域逐步连成一片。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中央苏区取得对国民党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赣南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项英、陈毅率领红军游击队坚持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由此可见，四省边界地带闹革命，党指挥枪，实施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中央苏区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特征。

中央苏区史历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热点领域。对于中华苏维埃历史，已从革命史、中共党史、政治史的视角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探究。如何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从革命史、政治史叙事走向社会史、整体史叙事应是一条可行路径。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提倡眼光向下，重视革命在民间的历史实践和反响，考察赣南民众如何看待、认识和支持革命。赣南何以能够成为中共武装领导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首选之地，进而成为红色故都和共和国摇篮。赣南大地的红色基因、革命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实践机制和经验，进而总结、提炼并阐释赣南红色革命精神，是这一研究的目标取向。

美国学者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中，以晚清以来生态恶劣、民众贫困的淮北地区为考察对象，从生态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视角，研究了淮北地区存在的掠夺性和防卫性生存策略，对曾经活跃在当地的捻军叛乱和红枪会等地域性民间

武装组织的历史做了考察，进而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进入淮北地区后对当地这种民众叛乱传统的打击、分化、瓦解，经过充分的思想改造和组织动员后融入共产主义革命大潮之中的历史。^③对于赣闽粤湘交界地带来说，中共及苏维埃政权到达这里后，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是12世纪以来民众出于生计需求而形成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地方动荡、贼民不分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宗族组织发达，宗族氛围浓厚、聚族而居、围屋圩寨林立，地方武装自保的状况。中共的革命理念和思想如何在赣南大地生根发芽，发展壮大，考验着中共局部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

赣闽粤湘交界地带山林密布，环境闭塞，民间枪支流行，历来匪患严重。为发展和巩固苏维埃革命政权，红军对土匪和会道门组织相继采取了教育、争取、打击和消灭的政策，号召“绿林弟兄加入红军”“欢迎绿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15] (P476)}确定了党对流氓问题的总策略，“给予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15] (P513)}，由原先的长期脱离生产返回到与生产相结合，成为自食其力的苏维埃公民。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反对流氓，不是消灭或反对个人，而是反对其错误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在取消会匪组织的前提下，团结、争取和引导他们加入革命，“对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与革命为敌的土匪，解除其武装，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对动摇不定者打入其间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将其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只有有革命事实表现的集团土匪才予以收编，收编后进行改造；对所有解除武装或觉悟来归的下层群众，与士兵一样待遇”^{[16] (P69)}。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对土匪会道门组织采取的上述策略极为成功，在赣西南，“几十万会匪整个的站到了党的领导下面来”^{[17] (P116)}与工农一起自发的斗争。苏区社会环境得以改善，一时间盗匪绝迹，烟毒肃清，许多农民门上贴着“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游民”的对联，成效可谓显著。

对于苏维埃运动，赣南乡村宗族分化为支持、中立和反抗三种类型。^[18]中国共产党对于赞成革命的宗族，给予政策优惠，减轻或免除红军家属在税收、服役方面的负担。对持中立态度的宗族采取宣传、教育政策，引导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对于顽固不化、对抗革命的宗族，坚决给予镇压。1931年10月，毛泽东和朱德专门制定了《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称“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19] (P257)}。历时4个多月，苏维埃政权区域内的土围子全部被拔除。革命进入乡村后，充分利用宗族祠堂的功能，将其改造成为办公场所，利用宗族为新社会服务，用阶级意识取代宗族意识，发动群众对地富土豪开展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方式破除宗族意识，深刻影响和改造了赣南乡村社会。

赣南区域社会在革命者进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赣南由此成为中共领导苏维埃革命的“红色故都”和“共和国摇篮”。工农红军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兴国是著名的将军县，当年有80%的青壮年参加工农红军，其中有近30%的人为国捐躯。可见，深入开展苏区社会史研究，挖掘赣南红色革命精神，不仅是赣南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体推进赣南区域社会史学术创新的必由之路。

五、结语

结合赣南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区域社会历史，本文着重从以上四个方面对进一步开展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做了简要论述。就以往研究而言，这四个方​​面都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已基本构成了赣南区域社会研究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如果概括赣南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人口流动、土客矛盾、治乱交替、孕育革命，是其主要特征。以此为出发点，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开拓创新，离不开视角的转换。

我们发现，生态环境在赣南区域社会历史变迁中的确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推动赣南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必将会产生新的课题和成果。就客家人、客家文化和赣南宗族史的研究而言，将研究视角从认知论、变迁论变为以客家人为中心，突出主体性，关注他们如何讲述和构建自身的历史，同样也是一个视角的创新。对于阳明文化和地域社会，过去研究重视阳明在南赣的作为和影响，注重考察阳明文化、阳明思想，同样缺乏底层和区域的视角。将阳明文化与地域社会相结合，从民众和地域的角度来阐述阳明南赣平乱和教化带给后世无论官员还是民众的深刻影响，才有助于发掘地域特色，将阳明学研究引向深入。至于苏区史研究，在以往注重革命史、党史、政治史研究范式基础上，将眼光投向民众、底层和社会，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和展现革命带给苏区社会的改变和影响，有助于实现对苏区史的整体性把握。

需进一步强调的是,就社会史自身发展趋势而言,区域社会史研究虽仍是学界主流,但已面临新史学的冲击和影响。西方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环境史、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等接踵而来,研究者要守正,更要开拓和创新。充分吸收借鉴新史学的理念和方法,是不容回避的。结合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特点,笔者认为在环境史视野下开展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是切实可行的。

历史时期,赣南地处四省交界地带,山林密布,洞穴众多,地广人稀,人员流动频繁,社会秩序动荡,盗乱频仍,民风剽悍,官方统治薄弱,成为非法组织的“发源地”和土匪活动的“大本营”。虽屡经治理,仍难以实现对此地的长治久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与之相互适应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高耸的客家围屋,通往外部世界的水上交通、陆上通道,易于藏身的山林洞穴,与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及其宗族,共同塑造了赣南地域社会的特性。从王阳明到蒋经国,从盗乱之地到中央苏区,赣南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族、文化、信仰均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环境和人的互动造就了区域社会的历史。

综观赣南以动荡为主线的历史过程,若以环境史的视野对其加以重新审视,必将有助于推动赣南区域社会研究的再出发。对此前景,我们拭目以待。必须指出的是,中央苏区时期彰显出来的赣南红色革命精神,以及新时代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彻底扭转了赣南历史时期的局面。究其原因,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的举措从根本上解决了赣南的民生问题。

参考文献

- [1] (清)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 [2] (明)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吴光, 钱明, 董平, 姚延福, 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3] 唐立宗. 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化与地方行政演化[M].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 2003.
- [4] 李晓方. 明清赣南社会史研究[M]. 北京:中国书店, 2019.
- [5]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M]. 清实录:第 34 册.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 [6] 方世藻, 谢敏华. 蒋经国先生主政赣南新探[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3, (2).
- [7] (清)谢旻, 陶成. 江西通志[M].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3-518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8] 李晓方. 烟草生产在清代赣南区域中的地位 and 作用[J]. 农业考古, 2006, (1).
- [9] 罗香林. 宁化石壁村考[A]. 客家史料汇编[C]. 香港:中国学社, 1965.
- [10] 罗勇. 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A]. 吴泽. 客家学研究:第 3 辑[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饶伟新. 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J]. 史学月刊, 2003, (12).
- [12] 李晓方. 王阳明龙南史料辑录[M]. 北京:中国书店, 2021.
- [13] 桶冈洞向导记[A]. 思顺何氏族谱[Z]. 光绪二十三年木活字本.

[14] 李晓方. 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 明清《瑞金县志》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5]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册[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16] 何友良. 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17] 江西省委致中央信——江西总暴动之决定(1928年2月7日)[A]. 江西党史资料: 第4辑(赣南农民武装暴动专辑)[Z]. 南昌: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987.

[18] 谢庐明, 曾小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南乡村宗族与苏维埃革命——兼论中国共产党对宗族的认识和政策[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6, (1).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注释

①参见: 黄志繁《贼民之间: 12-18世纪赣南区域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版), 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 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化与地方行政演化》(台湾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碑存于赣州市龙南县西昌围祠堂内。

③参见(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